

广播体操60年：

远去的集体主义？

本报记者 任鹏

身为山东人的画家刘大鸿肯定想不到，自己的美术作品——《第九套广播体操图解1》在完成19年后，国家体育总局发布了“第九套广播体操”。如此巧合，以至于知名学者、同济大学教授朱大可半开玩笑地说，刘大鸿绘制的“第九套广播体操”居然被体育总局正式推出。

刘大鸿1992年创作的《第九套广播体操图解1》中，描绘出各色人等：政治领袖、王公贵族、古代人、现代人，不同阶级的人，甚至还有雷锋同志。无论服饰、动作，甚至表情，充满个性、形态各异、千差万别。而真正的广播体操，却只能是整齐一致、场面宏大。

当然，这仅仅是一个巧合。新中国成立60年，广播体操曾经是政治，曾经是暗示，曾经带有色彩，也曾经是“国家主义”“身体政治”的浓缩物。

最终，每一套广播体操都在不经意间化为所在时代的符号。

在几乎就要被人遗忘的时候，“第九套”再度创编，它一出现，便想以改变，跟上并适应这个时代的行进节奏，并努力褪去某种意志和色彩。

“真正的社会主义体育”

“广播体操诞生有60年了？哦，也对。”8月16日，第九套广播体操创编组组长、北京体育大学体育艺术系副教授张平被记者问及，略一思索后说。

1951年11月24日，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筹备委员会公布了第一套广播体操。

第二天，《大家都来做广播体操》的消息赫然刊登在《人民日报》上。

这似乎是一种意味深长的暗示。

一周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第一次播出了广播体操的音乐。教育、卫生、工会、青年和妇女组织共同组织了“广播体操推行委员会”，各地出现了大量的“广播体操骨干分子训练班”、“广播体操传授站”等组织。

半年后，《人民日报》再次刊登文章，总结推广的丰硕成果。据北京、上海等13座城市的不完全统计，参加广播体操的人数达到104.8万。学校学生最为踊跃，仅北京市统计就有23万学生参加，上海各所学校学生80%以上每天做广播体操。

“广播体操其实是舶来品，受到了前苏联体育制度的影响。”张平介绍说。

1950年8月，体总筹委会向苏联派出了新中国第一支出国访问的体育代表团，“劳卫制”给了中国体育代表团成员很大启发。

“劳卫制”全名叫“准备劳动与保卫祖国体育制度”，体操是其中一项内容。不需特殊场地、设备、服装或器械，不同年龄、性别的人都可以做，便于大范围推广，这让代表团深受启发。

1954年，第二套广播体操应运而生。更新周期不足三年。

又三年，第三套广播体操正式公布时，《人民日报》再次刊发消息：《第三套广播体操公布了》。

广播体操的更新被规定化了。短则三年、长则九年，势必要推陈出新，以适应时代要求与统一人民的意识。

如今，重新聆听广播体操口号的开头，还能体会到每套广播体操所对应背后的时代政治风雨。

1963年的第四套广播体操中有一个响亮的男声：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套广播体操——时代在召唤。

公布于“文革”高潮时期的第五套广播体操，开头可以听到：“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发展

8月8日，第九套广播体操正式发布，从1951年第一套广播体操发布，距今已经60年了。雄壮的音乐、嘹亮的口号、新鲜的空气，在阳光下做一套广播体操，是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记忆。

如今，这种记忆离中国人的日常生活越来越远，广播体操所代表的集体主义也在价值多元的今天被边缘化。第九套广播体操的发布，还能帮我们重新唤回那段远去的集体记忆吗？



▲8月10日上午，北京市总工会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行第九套广播体操培训。CFP/图

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第五套广播体操现在开始……”

甚至，眼保健操开头也会有这么一句：“为革命保护视力”。

这时期，还相应诞生了一种具有阶级斗争功能的“语录操”。与广播体操套路基本相同的每一节，都加上毛主席语录内容，强烈的色彩情感感召下，做操者同时高声朗读语录。

有的地区早上不做操就要扣工分。大型广播操则采取半脱产、记工分进行强化训练，不过，有人也乐得不干活还能挣工分。

“应该说，上世纪七十年代之前，广播体操在一定程度上带有很强的政治性。那时候，做广播体操就是政治任务，有政治动员的意思。”8月16日，国家体育总局群体司活动指导处处长贺凤翔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1979年前后，法国、埃及、伊朗代表团来中国考察广播体操。看到成千上万的国人动作整齐地做着这种大庭广众之下的集体运动，他们认为广播体操染上了意识形态的色彩，称广播体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体育”。

“中国人成长岁月里的背景音乐”

当时代翻转，新的广播体操又出现，让人回想起往日的少年时光。关于广播体操，透过泛黄的回忆，成为集体怀旧，一时间青春无敌。

“kgmvp”在网络上贴出一段“中学生做广播体操”的视频，打翻了网友们回忆的水瓶。

但，除了对于逝去青春的怀念及做操时能偷偷瞄一眼暗恋的女孩，“80后”对做操那些事的回忆，并不总是那么美好。

“总是想偷懒，有时候还会被校警和保卫科长追着乱跑。不过青春无敌呢，就是觉得好玩，就是要那么刺激。”一位网友回忆。

31岁的高磊先生，如今是济南一家单位的科室领导。他年少做操的经历总是不愉快的，甚至很排斥。高中后，他想尽方法逃避上午第二节课后全校统一的课间操。一般会故意磨蹭留在教室，或选择上厕所，在腐臭中消磨掉15分钟。实在逃不掉，就跟在队伍末尾，动作敷衍，应付了事。

“青春期的反叛中，对于个性与自由的渴望是强烈的。但一个个活泼的个体，却被圈限于整齐划一、动作一致、摒弃自我、弘扬集体的团体操中，即使心有不满，

却恐惧反抗。”高磊说。

“躲在教室装肚子痛不下楼的有木有啊！跳跃运动跳到别的队伍里去了的有木有啊！在教室睡着了被广播吵醒了发现没人叫自己的有木有啊！下雨天不用下去做操很开心的有木有啊！做完操回教室在楼梯处到处拥挤的有木有啊！回教室的路上把男生往女生身上推的有木有啊！”有善于搞笑的网友总结出这样的咆哮体。

学者朱大可说，他和很多人一样，小时候被灌输了太多这样的东西。“这是一种被奴役的文化惯性，有人很赞赏它，因为它是中国人成长岁月里的背景音乐。但它绑架了所有人的童年。”

在“茁壮成长”的那个年代，拒绝做广播体操是一种严重的“政治错误”，要受到批评和处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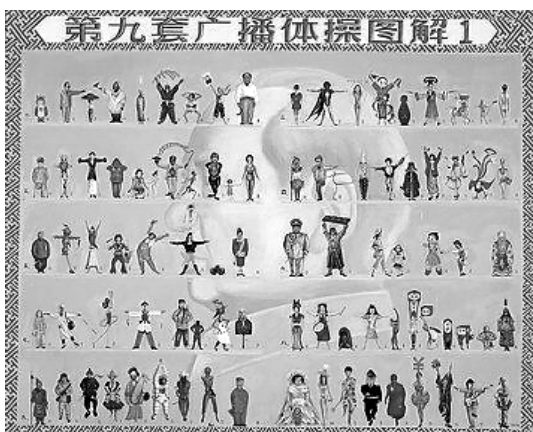
“因此，它必然是一种有代价的反叛，没有哪个孩子胆敢坚持抵制这种制度。”

把广播体操看作一种集体主义美学的羽戈也是“80后”，考试从不作弊的他，倒是在广播体操这种集体主义运动当中，深得作弊之乐。

新时代的广播体操，淡化了全民参与的阶级色彩，但政治化的集体主义却又被注入到其中。

1996年准备创编第八套广播体操时，时任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提出官方推荐操概念。“官方操是我们提倡的，没人做也得搞。因为这是个举旗帜的操，这个操是个‘政治操’……比如说官方组织会操，需要规定动作。”

从朱大可文化批评的角度看，集体广播体操包含三个政治



▲画家刘大鸿1992年创作的《第九套广播体操图解1》。

那些广播体操的故事

1951年，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筹备委员会和中央广播事业局共同决定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各地人民广播电台举办广播体操节目，并在同年11月24日公布了第一套成人广播体操。第一套广播体操推出两年多之后，在群众的要求下，1954年，国家又颁布了第二套广播体操。第二套广播体操进行了重新编排和调整，增加了运动量和动作难度。

由于前两套体操大量学习和借鉴前苏联的内容，在1957年推出的第三套广播体操中，融入了很多中国传统武术的动作。在创编中，也请来多位武术大师。这套广播体操中国特色更强，这一特点也在后来的广播体操中得以延续。

文化大革命期间，广播体操运动曾一度中止。1971年，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发出通知，向全国人民公布了第五套广播体操。

十年后，第六套广播体操正式与公众见面。其动作新颖、舒展，并首次配制了两首富有民族风格的乐曲，可以交替使用，以此来增加人们做操的兴趣。

1990年5月，国家体委又继续推出了第七套广播体操。还特意请来当时最著名的体操运动员李宁做模特。但根据后来的调查，人们普遍反映其动作难度较大，不便于掌握。

1997年，国家体委公布了第八套广播体操，得到了最广泛的普及。（宗和）

因素：它是一种被召集起来的集体行为，它要求所有参与者保持动作的高度一致性。它需要使用高音喇叭。“从过去到今天，广播体操的本质没有太多的改变。它们都必须把许多人集合在一起，做一模一样的动作。都是为了统一民众意志，塑造集体主义精神。但集体做操，步调一致的时代，则应尽早成为历史。”

谁改变谁？谁适应谁？

几十年来，广播体操高高在上，个体只有服从，只有适应它。如今，广播体操却矮下身架，开始努力迎合大众的口味。

“在保留传统体操模式的情况下，第九套广播体操增加了十几个下肢动作，平衡了全身的锻炼负荷，特别注重后背和臀部肌肉，适应人们当前的生活工作习惯，符合现代人的学习、生活特点。”张平介绍说。

贺凤翔也承认，如今社会，存在着多样化的健身锻炼方式与手段。广播体操如何能让“80后”、“90后”甚至“零零后”接受，都是很现实的问题。“广播体操的体育文化是最具中国特色的，需要倡导一种文化传承，更能体现以人为本、个性与自由。在推广方面，肯定不能再像十几年之前那样进行强制。”

贺凤翔介绍，目前，国家体育总局正在进行国家级广播体操教练员培训，9月开始，各省将进行层层培训。但这样的培训，现今仅限于体育、群体系统。

“广播体操被称为国操，历经60年，人们对它的认识，也需要有一个逐步的过程。现在，广播体操仍具有培养团队意识等作用，你可以把它仅仅看作一种单纯的健身方式。”贺凤翔说。

但朱大可仍然把广播体操看作是整齐划一的“官方动作”。“这是国家主义身体政治的浓缩物，它首先是一种政治需要。通过身体的规训，统一的身体动作，而推动统一意志和统一思想的建设。”他这样回复记者。

更有评论声音认为，广播体操的式微，意味着国家权力在国民生活中的退场，意味着“集体主义”这个名词的渐行渐远，公民的个人权利和自我意识开始勃兴。

曾参与了第六套广播体操创编工作的刘西玉记得，1987年前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第一次停播广播体操，几乎同一时间，各地方广播电台的广播操节目也陆续在电波中消失。

进入上世纪八十年代，广播体操更新的时间明显拉长。第六套的出现用了10年，第七套、第八套分别用了9年、7年。而新的广播体操的公布，更是间隔14年。

“现在开始做广播体操，原地踏步走……”这三套广播体操的开头音乐中，已经听不出任何的时代特点。

告别过去，1981年，第六套广播体操在不经意间，完成了“去意识形态化”的嬗变。如今，广播体操正为自己塑造一种不带任何色彩的普通健身操的形象。

更能说明问题的是，第九套广播体操“针对的是成年人”。而现今中小学生的课间操，是教育部门专门针对未成年人身体发育而创制的。

如此一来，朱大可便大可不必担心广播体操会“绑架童年”了。

所以，羽戈才会说：通往健身之道，不必经行广播体操的集体主义路径。你跳舞，我练瑜伽，你打酱油，我做俯卧撑，正如你在清晨的阳台上独自做广播体操，我在床上做早操，何必跟随集体主义的节奏，在百万人里迷失自己呢？